

← (上接 11 版)

也是一部严肃的补史之作。这也表明,作为曾经续修过纪传体《国史》的史官,柳芳对于《国史》所载李弘的死因是有疑问的,而这疑问或许源于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史料,或许直接来源于高力士的口传。而高力士于圣历年间籍没入宫,当时尚不满十岁,据其本人墓志,武后曾亲命“女徒鞠育……令受教于内翰林”,因此他对于高宗武后时代的传闻轶事,即使不是亲历者,也算是耳目所接,故而《唐历》所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李泌这段话本是对肃宗的劝谏,最早见诸《旧唐书·承天皇帝俊传》,史源大约是李泌子李繁记录其父传奇人生的《邺侯家传》。李泌自幼年时便为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号称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他谓此说系幼时所闻,应即是玄宗时代宫廷及上层流行的说法,他引述的时候或许有所增饰,但与《唐历》论调一致,也意味着与高力士的口传正相吻合,故《通鉴》谓“时人以为天后酖之”,是非常慎重而妥当的说法。

另外从李弘去世之前数年的活动轨迹来看,也不太符合因病去世的特征。考李弘咸亨二年(671)正月以皇太子监国,此时据其死亡还有四年时间,虽然本传称其“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但本年高宗及武后还在为他张罗婚事,显然此时即使身体状况不佳,亦尚未对生活有重大影响。咸亨四年(673)七月——李弘去世前十五个月——高宗在九成宫作太子新宫,并在次月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同年十月,李弘正式行婚礼,至此亦看不出李弘的身体状况有何异样。而高宗的这一切布置,让我们感受到他尽力栽培李弘的苦心,因而至少此时李弘的健康问题远未引起高宗的担忧。之后的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674),现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太子的行迹,他似乎突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最终突然薨逝,是否此时李弘的身体状况有所恶化?的确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十一月初一,也就是李弘去世前五个月,高宗自西京赴东都。按此前李弘受诸司事的延福殿在九成宫,即今陕西麟游县境内,之后太子大婚,自当与高宗同在一处,因此此番赴东都,李弘亦应随驾而行,故而最后于东都苑内的合璧宫去世。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两京之间里距约八百五十里,这一次行程前后二十三日,而李弘此时尚能耐受这样长时间的旅途奔波,可见此时其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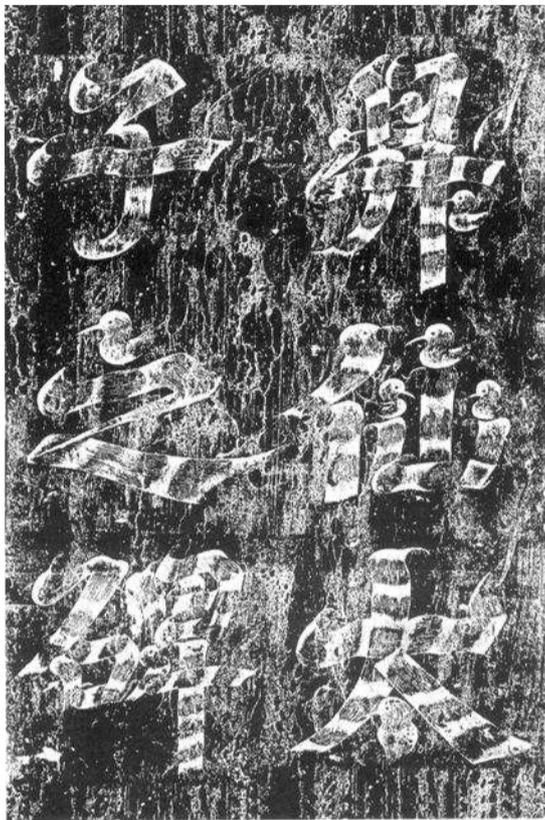
尚不至太差。李弘最终去世的合璧宫原名八关宫,系高宗于显庆五年所造,其位置在苑最西端,据考古发掘,即在洛阳市西南16公里的辛店乡龙池沟村,此宫落成后,高宗多次在春夏间往彼处度夏,上元二年的这次巡幸,同样也是例行避暑,李弘亦在随行之列,此时距李弘去世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如若太子最终因慢性病致死,此时应已病入膏肓,很难想象他还能够随驾前往合璧宫。

另一方面,高宗在李弘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想传位给他。这在李弘死后所有以高宗名义发出的制敕和高宗亲笔撰写、亲手书石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中都表达得非常清楚,而李弘遂因此突然死亡。虽然现代医学证明心绪激动的确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最终导致猝死,但这通常发生于中老年人身上,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因此遂至身亡,似乎不可思议。再则高宗传位,风疹不能听朝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李弘此时已然危殆,高宗如何可能让健康状况更糟的太子来承担这一重任?因此,即使李弘的身体状况不佳,但此时应还不至于危重到很快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高宗与武后的矛盾在麟德元年(664)杀上官仪之后已经暴露无疑,对于高宗而言,最重要的砝码便是太子李弘,因此从他被立为太子开始,高宗就着力对其加以培养,李弘的多次监国便出于这一目的。尤其是李弘去世前两年,高宗特意为其在九成宫营建新宫,并让他处理诸司启事,这或许表明高宗希望太子以九成宫为核心,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最终能够将权力交到他手中。高宗希望传位于李弘,一方面是出于健康状况的考虑,另一方面,太子即位,太上皇犹在,太后再要垂帘听政,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于是在合璧宫中,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弘,而李弘随即因此死去!李弘的死让高宗自责不已,在他亲手撰写的《睿德纪》中,他将爱子“遗永诀于千古”归咎于自己的“不慈”。恭陵选址缙山王子晋庙左近的懊来山,大抵取其懊悔之意,高宗所痛悔的或许正是他自己贸然的传位念头,直接造成了爱子的身亡,这也许是高宗对李弘唯一的“不慈”。

无论如何,李弘已然去世,高宗能做的只是给予他足够甚至是过分的哀荣,于是我们看到了李弘被谥为孝敬皇帝,同时为了供奉恭陵,高宗甚至重置了贞观十八年已然废除了的缙山县,而会家人于缙山正是王子晋传说最重要的场景,或

许高宗情愿相信,爱子只是升仙而去,也许有一天还会在缙山与家人相见,恭陵选址缙氏,或许正是缘于高宗这一寄托。至此以后,王子晋升仙成为唐代悼念太子的惯用意,之后,祭祀章怀太子、懿德太子等的歌词中都用到了这一典故。因此在武后圣历二年撰作《升仙太子碑》的时候,不可能不想起她的长子李弘,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武后之所以亲撰这通大牌的一部分原因便在于追思李弘。



薛稷以飞白体书就的“升仙太子之碑”

李弘死后,我们看到了高宗的哀痛,却看不到武后的态度。同样,原本应该是往来洛阳与嵩山之间交通要道的缙氏县,在武后登封之前也从未出现在现有的记载中,从碑文中庙宇的颓败状况来看,武后此前也似乎从未关注过王子晋与其破败已久的庙宇。而自从此次巡幸之后,恭陵所在的缙氏县似乎成了往来两地的必经之地,之后的神功元年(697),武后专程来此寻访王子晋遗迹,圣历二年和久视元年,她的两次嵩山之行都取道此地,甚至还在缙氏县北十里建起了行宫,而恭陵在缙氏县东北五里的懊来山上,在行宫东南五里有余,几乎就在行宫旁边,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恭陵,和代表着孝敬皇帝的王子晋,武后的心绪应该颇为复杂。王家葵先生认为当她在选择储君问题上举棋不定之时,想起了当年骤然离世的长子李弘,这一认识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确,周既代

唐,六十七岁的武后身后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现实,各方早在天授年间即展开了争夺:

天授二年……凤阁舍人李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仍奏请切责上书者。(《旧唐书·岑长倩传》)

此时,非但群臣反对,武后自己的心意亦未有定准,然而“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李)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

力也围绕着这个问题频频展开较量,直到二张和吉项的出现。

张昌宗是神功元年,由太平公主推荐,入侍武后的,后人往往视此为宫闱秘事,以为笑谈,实际上太平公主虽然身嫁武氏,但却是李唐方面的重要人物,显然太平公主希望通过二张,不露声色地对武后施加影响。二张进入宫中之后立刻获得了武后无条件的信任,而他们也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李唐:

张易之兄弟贵宠逾分,惧不全,请计于天官侍郎吉项……项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立庐陵,以系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间屡言之,则天意乃易。既知项首谋,乃召问项。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托于陛下,唯陛下裁之。”则天意乃定。(《资治通鉴》卷二〇六考异引《谭宾录》)

《谭宾录》多出于国史实录,其史料多可信,类似的记载亦见诸韩琬《御史台记》《新唐书·狄仁杰传》,而《御史台记》的作者韩琬与张昌宗曾有过交往,《御史台记》内容涉及武后至开元时的各种轶事,可谓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述应极可靠。《新唐书·狄仁杰传》的史源则是记述狄公生平的《狄梁公家传》,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都表明,当时二张在立储问题上的确起了关键作用。而《谭宾录》中提到的吉项也是武后所信任的身边人,此前,当武后在诛杀来俊臣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吉项趁着陪武后在苑中游玩的机会进行劝说,从而最终促成了来俊臣的被诛。而吉项本人的立场,《通鉴》明言其“附太子”,可以相信,吉项背后的李唐势力通过他成功地游说了二张,决定了圣历年间的政治走向。

圣历元年九月,李显终于被立为皇太子,这事实上已经决定了武周王朝的覆灭和李唐王朝的复辟,此后,武周朝政治开始转向。立储后不到半年,武后专程去了升仙太子庙,并且在这里盘桓了至少九天。这段日子武后应住在离恭陵不远的行宫。在这重立太子之后的微妙时刻,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恭陵,她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李显并不是武后理想的太子人选,他被母亲赶下皇位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宗欲以韦后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裴炎与其相争之时,竟然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的昏话。他对韦后的宠任,显然是武后所不愿看到的。其实武后对于李显的冷落,在更早的时候就有所表露:

余众乃息”(《旧唐书·李昭德传》)。事平之后,李昭德的一番话可谓一针见血:“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旧唐书·李昭德传》)武后因而醒悟,遂暂时打消了立武承嗣的念头。这一论调和后来狄仁杰的进谏如出一辙,而最后也因此打动武后,迎回中宗。的确,这是身为女性的武后在此问题上的软肋所在,武周皇朝要千秋万代地姓武,当然需要一个武姓的继承人,虽然武后令李显和李旦都改姓了武氏,但他们仍旧是李唐王室的血脉,他们即位,武氏先祖仍旧不复血食。而武家子弟虽然可以延续武周皇朝,然而作为女性的姑母,武后自己身后又如何享受侄子的祭祀?这无疑是在武后称帝后必然会遇到的两难局面,而朝中两方面的势